

中国国情与现代化的土壤-“中国式现代化”

讲义系列第三讲

第三讲 中国国情 与现代化的土壤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本讲目录

引言

一、国情的客观向度

二、“天”情

三、“地”情

四、“水”情

五、“物”情与“业”情

六、“民”情

七、“势”情

本讲小结

第三讲

中国国情与现代化的土壤

引言

“国情”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无论是客观情势，还是历史沉淀；无论是民情流俗，还是制度惯性，都可以纳入到“国情”中去，我们在本讲中对国情的界定都是以客观性要素作为指向的“硬国情”，而把基于历史、文化、流俗而形成的“软国情”分解到以后各讲之中。我们提出的“硬国情”，即揭示国情构成的客观性要素，与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言的“终极变量”（**ultimate viarable**）大致相当，这些客观性要素的匮乏不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国家能力与国家能量，而且还具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可以把国家的任何阶级都拉到统一的生活水平。在客观性要素诸如粮食、水等资源处于极端和绝对匮乏的状态下，最高治理者和乞丐的生活水平可以相提并论，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说过：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们也可以说，当决定国家生存的客观性要素陷于绝对短缺之时，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平等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情要素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终极性的因果关系。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早发现代化国家都毫不例外地以攫取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作为第一目的了，当然，这些要素必须与其他要素——例如制度要素、技术要素——相匹配，才能释放出现代化的能量，否则就会陷入资源诅咒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一、国情的客观向度

正如上文所言，我们首先对“国情”作出了一种操作化的定义：国情即是指国家构成中的客观要素，例如：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为什么要对国情进行客观化的操作性定义？因为“国情”一词所包

括的内容相当宽泛，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方方面面——如果一个概念所涉及的内容无所不包，那么这个概念反而会失去解释的效力，

因此，我们在本讲中把国情中的客观要素聚焦为“天”情、“地”情、“水”情、“物”情、“业”情、“民”情、“势”情这七个方面，国情的背后，包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就是人与物的关系。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人对物的认知、改造、利用及其衍生出来的科学化、技术化、产业化、工业化等一系列支撑现代化的“硬”件系统，一个国家若总是琢磨“人”而不琢磨“物”，那就永远无法实现现代化。客观而论，中国文化中蕴含着较多的琢磨“人”的文化，可以说，中国人在琢磨人这件事情上消耗了不少的精力，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中国的学问“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①钱穆的本意是用这句话来批评西方文明和赞美中国文明，而若从追求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却恰恰相反——中国文化中在人事协调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多，《尚书·旅獒》中有一句话“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然而，现如今“玩人丧德”被提及得很少，大家只记住了“玩物丧志”，但如果从追求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之，则会发现“玩物不丧志，玩人则丧德。”中国文化所陶冶出来的人恰恰缺乏那些专心致志地去玩物的人。我们在大学里读书，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科学家、院士去当校长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如果由懂学校管理的专业人才来担任校长，管理人才与科研人才可以分工合作，对于大学来说可能会更好。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孔子总是在琢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老子、庄子与韩非子亦如此，人与“道”的关系都可还原为人与人的关系，思考人和物关系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普遍处于一种较为弱势的地位。然而，若总是琢磨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始终没有精力投入到现代化进程当中来，正如于右任先生所书的一幅墨迹所展示的：“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科学家与院士应成为一个不纠结于人事而醉心于物理的天真的人，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是中国典籍中难得一见的论述“人—物”关系的经典文献，这种与政治大事、政治人物完全不同的记载

①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引论，第20页。

弥足珍贵，钱钟书评价《货殖列传》时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蒙矣。”



图3.1于右任先生书法

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皆讲求“唯物”，只有唯物主义才能彻底改造中国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改造中国文化的原因，中国古代唯一能够为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的人物可能就是管仲了，《管子》被誉为“中国的《国富论》”，《管子》一书可以说是对“物”之研究的集大成者。除管子之外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所有学派几乎都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将人与物关系还原为人与人、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非常深刻的，但是深刻的东西不一定有利于现代化建设。著名作家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深刻的事物可能会让人无法承受。《管子》中有句名言：“君子使物，不为物使”，此论断对我们追求现代化与反思现代化都是极有裨益的。

关于“人—人”关系与“人—物”关系的分别，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曾经担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的沈国明老师于1987年参与了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研讨，并提出应当修改1982年宪法中所规

①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3页。

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因此，当上海第一块土地批租地块（虹桥第26号地块）出让时，媒体采访了他。采访见报后有市民来信称：“沈国明，你胆敢出让上海一寸土地，我就杀了你和你的全家。”沈老师说：“其实，我很理解市民的反应，因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根据香港的提法被简化为‘土地批租，土地批租’很容易被误解成搞‘租界’。对不是很了解这项制度的人来说，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摆脱了外国列强的奴役，现在又要搞租界，这是绝不能容忍的。这种误解说明我们缺乏对相关制度的宣传。现在，不会再有人把土地批租视作搞租界了，我有点遗憾，那封信如果留着，也是历史进步的一个见证。”在这里，沈老师解决的问题着眼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来信的市民将人与物的关系则还原为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之间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对于当时的上海来说，通过“土地批租”来开发“物”的价值，是上海实现突围和发展的重要出路。



图3.2管仲像

《管子·权修》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就一直在思考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一直呈现出一种伦理社会、人情社会，而非物理社会的特征。复旦大

①《管子》，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学政治学家曹沛霖先生提出新三权思想——即人权、物权与政权——其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老三权思想有所不同，人权是指人民应该拥有选举权，种族或者性别上的少数群体应具备独属各自的权利；物权指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政权就是国家，这新的三权思想更能使我们准确理解现代国家和现代化的底盘。

二、“天”情

在中国文化中，“天”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然之天，二是指主宰之天，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有时把天译为“heaven”，有时译为“Nature”，我们这里所讲的“天”情接近于后者，乃一个国家的气象环境，

中国具有着“天”情的优势，即气候的多样性，《管子》曾系统性地论述过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四季变换之含义，^④拥有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样四季轮替之自然韵律的国家并不多，俄罗斯长期冰天雪地的环境，其“天”情就注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短板，日本也在“天”情上处于劣势。日本具有季风地带最为特殊的气候，同时存在热带和寒带的双重性，因此频繁发生地震和海啸、台风和暴雪，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经在《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指出日本人的双重性——侵略好斗而又爱好和平；倨傲自大而又谦逊有礼；冥顽不化而又与时俱进；温雅驯服而又心怀怨恨；坚强勇敢而又怯懦胆小——这都可以在日本的热带性与寒带性兼有的“天”情中找到根源，特殊的“天”情提高的生活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日本人的双重思维的成立，韩国是日本的邻国，但自然灾害发生相对较少，可以说其“天”情胜于日本。

中国虽然往往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气候本身的多样性为中国提供了非常充沛的“天”情资源，各色不同的产业可以根据气候条件的不同在温带或寒带进行实验与生产。在与气温相匹配的地方进行实验，这对于一

^④《管子》，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便拥有了很大的选择余地，这也是为什么孟德斯鸠(Montesquieu)要探讨气候、温度与风俗、治理与制度之间关系的因。

三、“地”情

所谓“地”情主要指的是地理。例如海陆分布、海岸线的形状、土地类型、土地质量等，譬如管子就曾说过：“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

目前存在最极端的两大决定论，一个是马克思开启的经济决定论，另一个是地理决定论——这一决定论很像每一个人出生的家庭环境一样，是无法抉择、无法抗拒的，是一种宿命。如果一种理论被上升到“决定论”的地步，这非但不是批评，反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褒奖，无论如何，一个理论一旦被提升到“决定论”之层次，其影响力自然会延绵不绝的，其实，这两大决定论可以合为一体，而呈现出一种理论视阈，那就是“地理唯物主义”、《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就极为关注“地”情，无论他承认与否，他都是一个地理唯物主义者，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的老牌驻外记者蒂姆·马歇尔(**Tim Marshall**)也是典型的地理唯物主义者，他毫无犹豫地说：“国家、民族、家庭、个人都是地理的囚徒(**prisoners of geography**)。”他主张，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出路，地图禁锢了各国领袖，地图留给他们的选择和回旋余地比人们想象的要少，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上限”取决于其地理环境。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也可以加入地理唯物主义者队伍。他在《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一书中提出了三种时间概念——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从而揭示了地理空间的决定性特征。地理时间通过长时段来表达，社会时间通过中时段来表达，个人时间通过短时段来表达，基于此，布罗代尔创造了三个概念：结构(长时段)、局势(中时段)、事件(短时段)，他写道：“事实上，我力图解释的乃是法国的历

①《管子》，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2页。

Tim Marshall, *Prisoners of Geography: Ten Maps That Tell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Global Politics*, London: Elliott And Thompson, 2015, pp.3-4.

史与领土之间多种多样、错综复杂、难以把握的关系；领土容纳着和承载着历史，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解释历史，尽管还远不可能对历史做出完美的解释。自然景观和地理空间不单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多去的延续，不复存在的地线展示在我们面前，并通过崭新的场景再现出来；土地像皮肤一样注定保存各种旧伤的癍痕，”

这种地理唯物主义暗示着“地”情还包括另一层含义，即“地缘”，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导致的空间关系。历史是纵的地理，地理是横的历史。历史证明，“天”之骄子未必是“地”之骄子。例如，韩国虽然在“天”情上相对温和，但其“地”情坎坷不平。韩国由于独特地缘特征即半岛，总遭池鱼之祸，当中原的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屡次角逐时，韩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其中，譬如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宋辽战争、宋元战争、明清战争，均殃及当时的朝鲜半岛，与此相反，日本作为“岛国”在“地”情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国国土广阔，边界线漫长，邻居众多，与14个国家接壤，看似在“地”情上风险极大，其实不然。因为中国在边境拥有相对完整的板块，中国占有青藏高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喜马拉雅山脉延伸至云南高黎贡山，中国占据云贵高原，与东南亚的边界是崇山峻岭的山地和丘陵。在西北，中国还保有塔里木盆地与准格尔盆地，同时还拥有伊犁河谷，中国还凭借伊犁河谷的战略位置一连接中国和中亚的要冲，制定地缘大战略，即“一带一路”，实际上，伊犁河谷在“一带一路”推进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与中亚地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中国与朝鲜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东北与俄罗斯主要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其后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与蒙古则以戈壁荒漠为界。可见，中国的边界线均延伸到易守难攻的地形地物，因此大大减轻了国防压力，其“地”情并不悲观。

四、“水”情

①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8页。

“水”情就是指水的质量与数量、水的分布、水域与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对水的治理。

老子《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若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是思想史上的一厢情愿，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被称之为治水国家，所有发达的社会都可以被称之为治水社会。因为水作为终极变量，处于决定所有人之生死的地位，更不用说水与农业工业等经济发展的关系了，否则美国也不会倾8年之久去建一条连结纽约港与五大湖的伊利运河了。250年来，德国人开垦沼泽，排干酸沼，将莱茵河裁弯取直，建设威廉港，在河流高峡修筑大坝，以人的力量显著改变了自然的面貌，德国人塑造自然景观、治理水域、征服自然的过程，也恰恰是国家的成长过程，在美国学者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撰写的别有趣味的《征服自然：水、景观与现代德国的形成》（**The Conquest of Nature :Water ,Landsca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①，论是默默无名的农民、河工、渔民、淘金者和垦殖移民，还是名垂青史的工程师与王侯将相，都出现在“水的战争”场景之中，德国人对莱茵河的驯服与法国大革命在时间上是重合的。拿破仑建立的“莱茵同盟”，重塑了莱茵河流域的政治版图，支离破碎的小政权为形成中的现代疆域国家所取代。这既节省大规模整治莱茵河的外交成本，也催生了有能力担此重任的政治力量，“19世纪前，莱茵河没有固定的河床”，而“自然状态下的河流根本无法确立起固定的边界”，整治莱茵河也是边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治水国家与治水社会，这是无可争议的。直至今日，治水能力依然是比较中国和印度之国家能力高低的重要变量，甚至围绕青藏高原的水源、东南亚跨国水资源的管理，已经涌现出了“水外交”“水战”等崭新的议题，可见，水情不仅关乎个人生命与地方发展，还关乎国家安全与地区平衡。

水资源与治水社会高度关联。那么，无水社会、缺水社会的境况又是如何呢？伊朗学者霍马·卡图赞（**Homa Katouzian**）在那本脍炙人口的《新

①大卫·布莱克本：《征服自然：水、景观与现代德国的形成》，王皖强、赵万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月与蔷薇：波斯五千年》(The Persians :Ancient, Mediaeval and Modern Iran)一书中写道：

与土地贫瘠但水源充足的国家如荷兰不同，伊朗土地肥沃但缺水。缺水曾在伊朗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影响了伊朗农业体系和类型，还是解释许多社会要素的关键，包括伊朗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绵延的山脉和沙漠天然地将伊朗人民分割成相对隔绝的群体。但在这方面，干旱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将人民分割成更小的社会单元。……典型的伊朗村庄规模很小、与世隔绝几乎自给自足，这是土地干旱的产物，大范围的缺水让村庄之间相距遥远。村庄变成彼此隔绝、自给自足的社会和生产单元，它们的规模太小，无法成为封建领地：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来供养一位封建领主及其宫廷和扈从。另一方面，村庄之间距离太远，难以形成统一的封建领地。土地干旱和社会单元之间的隔绝，共同阻遏了封建社会 and 国家的兴起，而这两者曾占据了欧洲的大部分历史。出于这个原因，我将伊朗描绘为“干旱—隔绝型社会”。

通过水情理解国家与社会，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其中，从水情抽取出来的治水社会或水利社会，尤为重要，中国以农立国，必然是一治水社会。大禹治水的故事肯定不是传说，应该是中国最早进入治水社会的历史起点与历史记忆。至于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从治水社会推导出东方专制主义，纯属无稽之谈②——美国和欧洲国家同中国一样都是治水社会。如果美国不是治水社会，就不会在纽约和五大湖之间建立人工运河，可以说，正是美国北方五大湖及其与纽约之间的运河，孕育了美国北方的城市群，这些城市之所以成为重工业中心，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便利、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便利的水运条件。五大湖沿岸的丰富资源和充足的水源促使其周围发展出了庞大的工业和诸多城市，其中较著名的城市有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和加拿大的多伦多、蒙特利尔等。

①霍马·卡图赞：《新月与蔷薇：波斯五千年》，王东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12-13页。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67060051036010003>